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研究的几点想法

——《中国外交思想史》(第一卷)序言

叶自成

—

古代的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天下和世界的概念,这其中也包含着外交思想的因素。中国最早的文献之一《礼记》中,就有所谓“天下”的称谓,并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和平)……是谓大同”的思想^[1]。到周朝时,由中国古代国家组成的体系共有周分封的90多个国家和约400多小方国。周朝时的中国,就是2000多年前在东亚存在过的“联合国”。^[2]当然,初周时的国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

在商朝产生了“国”这个字。殷商的甲骨文文字中,国字写作口戈,意思是用武力保卫人口。军队,一定数量的人口,人们依照一定的行为规范(法律)做事,这些构成了古代中国国家的最初含义。到周朝时,国家进一步发展。邦可以被用来称自己的领地,如“朕邦”(帝王自称其国),“新造邦”(周王曾表示要在新的地方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也可称邻国为“友邦”,邦国也有大小之分,即“小大邦”,夏商周都自称为大邦。在《尚书》中也出现了“国”的用语,如《洪范》篇中叙述周武王访问箕子,箕子在对武王谈到如何治理臣民时说,“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意即只有君王才能给民幸福和惩罚,如臣下私自给民众幸福

或惩罚,就会给王室(家)带来危害,也会给国家带来危害,人们也会因此背离王道,小民也会因此犯上作乱。这也可能是古典文献中最早使用“国”这一用语的。《尚书》中还有多处使用“国”的地方,如在《酒诰》中说,周文王“肇国在西土”(在西方建立了新的国家),要求臣民不许经常饮酒,“越庶国”(同时也要求诸侯国也这样做)。《尚书》中还有“宗国”、“四国”、“小国”、“大国”等用法。

但无论邦还是国,它们都应当处于华夏统治者的统治之下。《尚书》第一篇《尧典》中说:尧明察是非,态度温和,诚实恭敬,推贤让能,他象天上的太阳一样,光辉照耀四海,他使九族和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天下都愿归顺在他的治理之下,各族百姓和睦相处。这表现出浓厚的天下大一统思想。在《尚书》在还有多处表明当时的统治者的这种大一统的天下主义思想,如“天下咸服”,“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政在天下”等,而这个“天下”(在当时其实范围是很有限的),又是以华夏统治者为中心的,因此又产生了“中国”的概念,在《尚书》的《梓材》篇中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的用语,意为上天把中国的臣民和疆土托给周王,可见早在西周初年,周统治者就已经自称为“中国”了,周朝就象是处于天下正中的中心,负有统治天下的责任。正是这种协和万邦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君王。

在中华文化圈内外的各诸侯国和小方国的关系,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秩序观念。在以周朝为中心的世界中,中心,次中心,次外围,外围等层次是清楚的。这种中心外围观在《国语》这部记述春秋时期的各国大事的史书中已经有记载。

周天子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华夏秩序中的当然的中心。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是:“天子经略(治理天下),诸侯正封(边界),古之制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语》记载说,“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

这就是西周华夷秩序的基本内容,中心统治者与距离不等的周边被统治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在空间关系上体现为每隔五百里的距离形成甸、侯、宾、要、荒等五个等级,(也有的说是形成“侯、甸、男、采、卫、蛮、夷、镇、藩九服),在时间关系上按日、月、季、年、终生五种时间关系来体现,在物质关系上则是祭、祀、享、贡、王等五种形式来体现,在政治关系上则是三层关系:华夏民族形成甸、侯、宾卫形成中心区,是华夏秩序的主要力量,与统治中心的关系最为明确也最为紧密;在华夏之外的蛮夷地区是拱卫中心的次外围地区,它们受华夏文化影响,与政治中心形成时紧时疏的关系;而不开化的荒凉地区的民族则是最外层,与华夏文化没有什么关系,与政治中心的关系只是偶然发生的关系。

中心与外围的关系通过联合国大会——“四方民大和会”得到确认。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上记,周公时为打算在东方的洛水营建新的都市,把各地的诸侯召集到一起。“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在这次会上向各诸侯发表了著名的《康诰》。这也许是华夏各方国的第一次“联合国大

会”。^[3]

周王室与其说是使用武力直接统治,还不如说主要是靠高度发达的文化的感召力对各诸侯国产生影响。周王室起初也有承认诸侯国,并赐予封号的权力,如在公元前704年,周桓王还派使臣到晋国,立晋哀侯的弟弟做国君。但到后来,它的承认各国的权力已经转移到各国或为大国所独有。各国停止了向它的进贡,也不朝见周天子。但它在道义上还是有很大的权威,它是各国承认的周朝的礼仪的合法的所有者,是当时文化的中心发源地之一,是所有大国在成为霸权国过程中必须要打的一面旗帜。周朝为各国的国际活动提供了一个活动空间,它的礼仪成为各国公认的意识形态。一部分国家聚集一起商讨共同问题的盟会成为这一时期的国际活动的舞台。春秋时期有数以百计的盟会召开。它也是周朝存在的主要形式,虽然从来没有一个有全体会员国参加的“联合国大会”。

由于周朝统治力量的式微,周朝体系中的国家通过不同的道路开始了独立国家的发展进程。

1. 中心区域的国家性质发生了变化,从附属于周朝的诸侯国发展成为独立主权国家。

周朝分封的诸侯国通过扩张,其力量越来越大,摆脱周朝的控制,成为具有独立主权地位的国家。这些国家在内部事务上完全不受周王朝的控制,在外部事务上相互承认各自的权力,绕过周王朝并进行直接的交往,取得了独立的国际关系主体的地位。即使用现在的主权国家的概念来衡量,它们也完全合乎国家的定义。它们拥有独立的军队,管理着固定的领土和人口,有对外交往的合法权力,能独立地制定自己的内外政策,能相互订立得到各国公认的盟约。这些国家如齐国、晋国、郑国、宋国等。

2. 次外围外围地区性质的变化,从外围地区发展成为中心区域内的新兴民族独立国

家。

这些国家和地区通常一开始是落后地区,文化习惯甚至民族都不同于华夏地区,与周朝统治者没有血缘关系,不是分封国,但它们接受周朝文化影响,通过引进周朝的先进文化,迅速发展成为先进国家。

秦国的成长是其中的第一个代表。秦本是戎族,为西戎部族中的一支,最初也不是周王室统治圈的成员,它是受周朝影响的一个周边小方国和部落,是周朝的一个邻居。因为地域太远,周朝甚至对它的间接影响也不大。只是因为秦襄公帮助周打败了入侵西周的西戎人,才得到周朝的承认,封为公,开始成为周联合国的成员。到公元前659年齐桓公称霸时,秦已经成长西部的强大的独立国家了。

楚国是新兴民族独立国家成长中的另一个典型。楚人最早的祖先是苗族,被战败后退出黄河领域,在长江中游建立起部族国家,周朝兴起时,一部分苗族归化周王,武王伐纣,又有一部分苗人从周军作战,但与周王室的关系只有象征性的从属关系。在楚这个地区居住的居民的性格起初也与华夏国家不同。因此楚在很长时期中被华夏国家称为蛮夷狄戎地区之一,更多的时候被称为南蛮,是一个不开化的落后地区。但楚通过自己的不断扩张,逐渐壮大起来。到了楚君熊渠时,楚国已经成为南方一霸,它强大到足以向周天子挑战,到公元前704年时,楚君熊通自号武王,其子楚文王在郢(今湖北江陵)建都,有地千里,宣布它有权统率南方的蛮族,不承认周天子的地位。再通过又一个100年的扩张,楚国成为华夏国家中领土面积最大,而且从与周朝的关系来看也是最为独立的国家,它甚至在名义上也没有承认过周天子对自己的宗主权。楚国一度居为华夏文化的南方中心,华夏文化通过楚国辐射到吴国和越国,把这两个南蛮国家变成了先进国家。

独立主权国家的出现使周朝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真正变成了一个联合国,过去它是

权力的来源,现在它只有各国承认它的权威它才具有影响。在此基础上也展开了中国古代国家之间的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有了专门的外交机构和外交官员(行人),外交思想也由此萌生。^[4]因此,中国古代的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虽然带有诸侯国关系的不确定因素,但它们的确具有现代国家的许多基本特征。^[5]

从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和国家间关系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在两千多年前的华夏大地上已经产生了一个古代的国际关系体系。

这也正是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一个基本依据。

当然,我们也必然指出,尽管我们可以用今天的眼光、今天的概念来审视和解读古代的国家关系,但应当说古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国家间关系,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今天的国际关系,两者有性质的不同,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外交、主权国家关系、外交战略等概念,都是初步的,没有成形的。

二

谈到中国的外交思想,人们总会拿它与西方外交思想进行比较。还有人可能说,国家,主权国家是自1640年以后才形成的概念,怎么可以用这些概念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过的不同政权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里包含了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人们往往把西方人用来描绘世界体系形成发展的概念本身,作为理解世界不同地区国家关系的一个模式,以为只有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只有在西方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之后,才产生了所谓国家、主权国家、世界体系,才有了世界秩序、外交战略、外交政策等现象。

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大多具有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关

系:各国拥有独立的政权,具有相对明确的领土和人口,各自独立决定和处理自己的内政外交,相互承认并达成了一些明确的共同的国家关系准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早于西欧体系的华夏体系。关于这一点,倒是一些西方学者比较谨慎,他们并不一定认为真正的国家体系在全世界都是从欧洲开始的,如通常被国内一些学人尊称新现实主义大师的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就说:通常认为真正的国家出现于1648年这一事实,是“仅就欧洲的国家体系而言”,并不适用于全世界。他甚至认为,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和印度的考底利耶时期出现的国际政治的本质和形式“依旧惊人的保持未变”。^[6]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也说,“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7]斯坦利·霍夫曼也指出,“我们不再倾向于把国际关系看成是始于中世纪末的,主要是西方国家的活动,我们的研究必须包括非西方文明国家的国际关系”。^[8]因此国内也有学者就此指出,所谓国际关系发端于欧洲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实际上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受经济交往的制约,此时并未形成真正的国际社会体系”。^[9]

尽管当时在中原大地上出现的华夏体系是在公元前770年到前221年间,但是,第一、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体系及其产生的外交思想具有早熟和惊人的现实性的特征,尤其是人文、社会、国际行为准则等方面,并不因为年代的久远而失去价值;正如另一位通常被一些国内学人尊称为西方现实主义大师的摩根索(Morgenthau)所说,“一种政治理论在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就已经发展起来的事实,并不能得出它必然过时、陈腐的推断”;^[10]第二,这一时期的中国经历了从西周衰弱、各独立主权国家产生、大国争霸到秦一统天下的大变局,这种“国际政治”的经历是一个历史的契机,这种历史的契机西方

在几乎两千年之后才出现。外交思想各种流派的产生及其达到的思想高度是与当时丰富的外交实践紧密联系的;第三,这一时期,中国是连续500年没有中断的国际形势的更替发展,经历了多极格局、两极格局、无序状态和单极霸权格局等等,外交思想能够发展的土壤非常肥沃,因而不但能够产生各种流派,而且不少外交思想的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所以,国内也有学者指出,提到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必定会提到春秋战国,“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华民族是个早熟、早慧的民族,春秋战国时期的所谓‘国家’关系虽然本质上与现代的迥异,但是当时的各诸侯国之间打交道的许多概念和内涵,诸如国家利益的出发点,战略与策略的考虑和操作以及对地缘、均势、矛盾主次的关照等,都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有其永久性和普遍性。”^[11]

还应当注意到,西方近现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思想虽然有不同的产生和源起,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方学者总结和分析西方的历史,尤其是古希腊古罗马和近代欧洲的历史有密切联系的,以至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国际政治就是研究国家间历史的科学,甚至把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称为国际政治学的最伟大的先驱,他的《伯罗奔尼撒的战争史》是两千年来国际关系分析的三部最伟大的经典之一^[12],而实际上,公元前623年间进行的晋楚城濮之战,公元前506~公元前473年间进行的吴越之战,公元前262~公元前259年间的长平之战和邯郸之战,无论是就战争的规模、范围、影响以及战争的水平而言,都远远超过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如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盟军召集过的最大一次军队的人数只有重装步兵16000名,轻装步兵约2~3万名,^[13]而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一战就灭掉了赵军40万,后来秦统一战争中的军队更达60~70万之众;古希腊是城邦国家,一城一国,而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大国一国就有

数十座城池；全希腊面积不过 13 万平方公里，伯罗奔尼撒岛又只占约 3 万平方公里，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面积达 2~300 万平方公里；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从前 278 年开始到前 221 年结束，长达 50 多年；丰富的外交实践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包含着丰富的理论总结的素材。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春秋左传》《管子》等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国际关系史的杰作，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思想和国际政治理论的素材。如国内不少学者谈到地缘政治思想都认为起源于西方，而美国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却认为中国在历史上的地缘战略思想很丰富，并引用《孙子》中的“衢地”概念来说明中国古代地缘战略思想^[14]。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方都有林林种种的外交思想，能不能有一个可行的方法对两者进行比较呢？应当说，西方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有许多东西是不可比的，如西方国家之间的平等观念、神权观念和教会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国家间法律意识等与中国大不同，但就国际政治学和外交学要研究的本质概念，如国家、主权、外交战略和策略、国家权力、国家利益等观念而言，就他们观察问题的主要方法，如认为人性本善的理想主义或者性本恶的现实主义对国内政治，国家间关系的影响而言，就他们的思考所达成的最后结论和思想如权力均衡（合纵连横）、霸权秩序、干涉主义或者国家独立、消灭战争、维护和平等而言，两者所涉及的内容又是同质的，是完全可以进行比较的。既然西方学者能够从总结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欧洲的历史中提炼和发展出许多外交学理论，那么中国学者也可以从远比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欧洲外交实践更为丰富的中国春秋战国的历史中，总结出可以与西方外交学理论进行比较的思想和理论来。

就中国和西方的外交思想的内容而言，两者具有许多可以进行比较的东西。两者都是先产生主张统一理想主义，后产生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在欧洲，近代以来的一个主题是欧洲统一，从意大利的但丁，到普鲁士的哥德，再到罗马教皇，许多政治家提出了在同一的基督教文明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欧洲国家的理想，以避免各国的残酷战争；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理想归理想，战争归战争，欧洲统一的梦想没有能够阻止各国统治者的贪欲的扩张，于是格老秀斯的国际法，主张国家主权论，承认各国的内政处置权，同时，提出国际法准则为各国国际行为的准则，理想主义开始为现实主义外交思想所取代，现实主义成为主流；在中国，则有管子提倡的霸权秩序，孔孟提倡的仁义秩序，其宗旨在于建立一个统一理想的和平的体系，回到周朝这个理想化的秩序中去；但战争教育了各国统治者，于是追逐权力和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成为主流，韩非子作为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法家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加强国家权力实现国家利益的思想。再如，从内容上看，西方有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主张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在中国春秋时期，文仲等人的超限制外交也有相同的主张，而且走得更远，带有东方特色。

当然，两者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如，理想主义都强调价值观念的共同性，因此，西方的和东方的外交思想中的理想主义者都是普遍价值观念的拥护者，他们从理性出发，认为人类社会本质是向善的，因此，建立一个长久和平的国际体系也是可能的。但中国外交思想中的理想主义流派，还产生了独有的派别，即老庄为代表的自然学派，认为任何人为建立的秩序都是不好的，只有顺其自然，才有最好的秩序；又如，苏秦等人的

外交谋略,把外交智慧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至,主张以谋略取胜。

更主要的是,尽管中国古代的外交思想和西方近代以前的外交思想相比更为丰富,,在时间上也比西方早两千多年,但中国古代的外交思想的命运却大大不如西方的外交思想那样影响深远。中国外交思想的命运与中国近代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个国运衰落的国家,自然不能有什么外交思想,不能有什么外交思想的体系和国际关系理论。虽然中国春秋时期的葵丘体系比西欧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早了近 2000 多年,虽然在东亚一直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国家体系,但现在人们研究国际关系,主要还是以欧洲和西方国家为主。

当中国在世界大国的道路上一天天成长起来之时,人们才猛然发现,原来中国古代的外交思想不但有丰富的内容,而且更让人惊叹的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局势的演变,在许多方面具有惊人的超前性,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似乎是冷战后世界格局的预演。

今天人们研究的许多热门话题,从联合国,集体军事联盟,国际秩序,经济制裁,武力威慑,遏制,到孤立主义,人道主义,干涉主义……等,在那个时期都能找到类似的例子和论述。

美苏两极对抗与晋楚争霸相似;苏联解体后的情况,使人想起晋国瓦解后出现的韩赵魏三国;当今的联合国的命运使人想起齐国、晋国等霸权操纵下的周朝;美国的霸权使人想起当年称雄一时的齐国和晋文公时的晋国;一超多强和多极化的格局使人想起了战国的七国争雄……

甚至西方主张的所谓新干涉主义,其实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比,在形式上其实也并不新。西方主张把人权放在高于国家主权的地位上,如果一个国家政权触犯基本人权的准则,那么国际社会可以进行干涉;而

在两千多年前,儒家的亚圣孟子就有所谓的仁义干涉的主张,他对齐国国君说,如果一个国家不实行仁义,那么推行仁义的大国,就有义务去解放这个国家的人民。孟子认为,仁义也没有界限,当天下大乱之际,应当有一个大国出来承担以仁义一统天下的大任,以解万民于倒悬之中。在他看来,“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孟子认为,“为天吏,则可以伐之”,^[15]就是说,仁义是一种天命,为了这种天命,是可以替天行道的。甚至于时髦的人道主义救援,在古代中国的外交实践中也有先例:当年的秦国为了帮助晋国,曾经向受到灾荒的晋国提供过大量的粮食,但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时,晋国不但不援助,反而趁机起兵进攻秦国,但这个不义之战甚至遭到了晋国士兵的反对,他们想不通,为什么要趁火打劫,结果晋国在战争中失败。这个例子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人道主义救援的观念。

当然,有些东西不好机械地类比,如七国争雄的结局是秦统一中国,就不好随便加以类比,但它是否意味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某种前景呢?!

不管人们对中国古代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怎样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走向世界大国过程中的中国需要总结过去历史上的外交思想,吸取前人的外交智慧,为中国解决日益复杂的外交问题提供历史的借鉴;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文明大国,既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西方的外交思想,但更需要结合中国外交的实践的特点,在总结中国外交思想的历史的基础上,形成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如不干涉内政的思想,虽然中国现阶段更多的理论依据来自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和西方主导的国际法的原则,但其实从中国外交思想的角度来看,也是可以找到历史的依据的。如老子

庄子的理想主义的自然学派,其根本思想包含了不干涉内政的内容;又如郑国相国子产的外交思想中,也有强烈的不许大国干涉自己内政的内容。如,郑国把郑国的法律铸于钟鼎上,在当时曾遭到与子产关系较好的晋国相国叔向的干涉,叔向给子产写了一封长信,向子产说明为什么不能这样作,但子产认为这是郑国的内政,对此作了反驳。

四

所以,中国人有必要了解和借鉴西方的外交思想,但实在没有必要卑薄中国的外交思想。人们没有必要一谈起理想主义外交就只知道德国人康德和美国人威尔逊,而不知道中国孔孟的仁义观和老子的小国寡民其实也包括着古代中国人对国家间关系的理想;也没有必要一谈现实主义就只想起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或美国人摩根索,而不知道苏秦、韩非子甚至荀子关于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也有很深刻的论述;也没有必要一谈起地缘政治,就只能想起德国人拉泽尔或英国人麦金德,而不了解管子和孙子也是中国地缘政治思想的大师。

在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外交思想也将为其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而且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首先取决于但决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军事力量,通过外交智慧表现出来的外交力,也是构成中国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国际政治学外交学理论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的落后,一方面可以说对西方的研究成果借鉴不够,另一方面也在于对中国外交思想史总结不够甚至可以说这一方面很不够,可以说是一个空白。许多主张先借鉴西方后创建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人忘记了,西方的国际政治学正是在研究古罗马古希腊的历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古希腊的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史》是影响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三部书之一。还有人认为,西方的现实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当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西方历史名著,但就其思想性理论性而言,它不见得就一定比中国的《管子》或《春秋左传》更加宏伟更加深刻。马汉的《海权论》,实际上也是对古罗马和古迦太基战争史的总结而得出的结论。而实际上,《管子》一书中包含的有关国际政治学的思想是很丰富的,《春秋左传》也可以视为一部伟大的古典国际关系的著作,一点也不会比《伯》书逊色;要谈权谋和对权力的追求,《韩非子》一书中包含的思想也不比马基雅维利差,至于谈到《孙子兵法》中的深刻的战略思想,就更没有什么西方古典的著作可以与之相比。所以,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的研究者们没有理由妄自尊大,的确有必要系统地学习西方的研究成果,但更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以为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创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学派的基础。

所以,在涉及某一个理论,某一个思想是否就是自西方某某人提出之后才开始流行,或下结论说中国没有什么什么之前,最好先研究一下中国的历史。比如,我们通常都认为在1640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没有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概念,认为古代中国存在过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家根本不是国家,但我们应当想一想为什么这么样说。例如,中国《管子》一书《七臣七主》篇中就有过“主权概念”,指出“藏竭则主权衰,法伤则奸闻”,这里的主权不是指现在意义上的主权,主要是指君主权力,但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君主不等于国家的思想,可见国家是高于君主的,而且当时的国家已经具有独立主权国家的意义,国家包括统治权,社稷,领土,人口,军队,且各诸侯国之间相互承认,组成了一个国际社会。当一些中国学者急于否认说这不是现在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时,西方的一些汉学家则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关于大

一统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反映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关于“主权的概念”在务实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当中的思考。[16]

在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方面还有一个较普遍的情况是,不少人在对西方理论进行完全有必要的介绍时,有些做法却很值得商讨。有的学者为了说明某个国际政治的概念,总是说它来源于西方,然后举出古希腊或罗马,或西欧中世纪的例子。

如民族主义的历史来源研究,国内学者多是说,早在中世纪欧洲就出现了某些民族主义的萌芽,如法国腓力四世向罗马教皇抗税,巴伐利亚公爵反对罗马教皇干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选举等,产生了最初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真正兴起是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法国大革命等;[17]这样介绍当然没有错,但使人很容易产生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也有一个民族主义起源问题,这一起源与欧洲的民族主义的起源有无历史联系?如果说反抗某种权力中心争取完全自主地处理领域中的事务权力是民族主义形成的某种标志的话,那么公元前704年前后,春秋时期楚君熊通自号武王,其子楚文王在郢(今湖北江陵)建都,有地千里,宣布它有权统率南方的蛮族,不承认周天子的地位,是否也能看成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起源?

又如有人为了说明道义与权力是国际政治中的一对矛盾时,就说其冲突的历史可追溯到古希腊城邦国家时期,并举例说雅典在科林斯与科西拉的冲突中,不支持同盟国科林斯而支持科西拉,所以雅典是为了国家利益和权力而背弃了道义。这从学术上说当然没有什么错,但让人感到有三点不好理解:

其一,西方学者为了说明问题,常常举古代希腊罗马的例子,这是很正常的,但当一些国内的同仁也举这样的例子来说明同样的问题时,就不免有些依样画葫芦之感,我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熟悉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西方的国际政治学者们照学术镜子时能从中见

到其古罗马古希腊人的影子是正常的,而我们中国学者如果也从中照出古罗马古希腊人的影子来恐怕多少有些怪异。因为古罗马古希腊文化对西方人的影响要比中国人深得多;

其二,西方学者的文章著作主要是写给西方人看的,所以他举出西方人熟悉的东西,而如果我们的文章主要是写给国内人看的,如果能举出一些中国古代的例子岂不更好,更能为中国人所理解和喜闻乐见?也许雅典和斯巴达还多少为人所知,而能有几个人知道科林斯及其殖民地科西拉?

同时,仔细读一下这段历史就知道,这中间也很复杂,不能简单地说雅典支持科西拉就是背盟不讲道义,因为这只是按照科林斯人的说法,而如果按照科西拉人的说法,他们反抗科林斯这个宗主国,是因为科林斯对科西拉人不尊重并进行侵略,科林斯不愿通过谈判解决,而首先对科西拉发动进攻,在冲突发生后,科林斯人不是首先谋求雅典的支持,而是去找与雅典有敌对关系的斯巴达的支持,让雅典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即使按照科林斯与雅典之间达成的协议,雅典与中立的科西拉结盟也并不违反雅典与科林斯达成的协议,因为任何希腊国家都可以自由参加任何方面的同盟的;况且,雅典与科西拉结成的是个防御性同盟。所以,从这个例子本身并不能得出雅典支持科西拉是不道义的结论,相反也可以说,雅典也是出于同情弱者而支持科西拉的,而且一开始雅典也没有直接参加科西拉与科林斯的战争,它只是派出军队阻止科林斯军队直接进攻科西拉。至少,引用这个例子是可以引起争议:如何判断争执中的一方的是非?中国读者本身不熟悉这段历史(大概也包括引用这个例子的作者本人),所以难以对此留下什么印象。[18]如果这个例子换成中国历史上的故事可能更好。比如说,春秋时期霸权国如齐晋等国一方面维护周王朝的秩序,帮助一些小国免于外族的侵略,如

齐国曾经帮助小国卫国击败外族狄人的进攻,并帮助卫国复国,以维护所谓的正义,但同时,齐国又做了许多破坏秩序,欺凌小国,掠夺财物的不义之事,甚至经常打着周天子的名义,侵占别国领土,对别的国家进行侵略。齐国在当时先后灭掉了 30 多个小国。^[19]

由此产生的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说这个冲突追溯到公元前 5 世纪的古希腊而不是公元前 7 世纪的中国的春秋时期的齐国称霸?按理说,既然追源当然越早越好。西方作者只知道古希腊而不知道古代中国是情有可原的,但中国学人不知道春秋时期的齐国称霸和管子却有些说不过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外交思想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创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学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很多人从很多方面做系统的工作,不是这一部书就能完成的,本书只不过是那些有志参加和从事这一工作的人提供一个可能有益的基础。

注释:

- [1]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6 月第五版,第一册 25~26、30 页。
- [2] 有人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为外交提供了广阔的领域,外交艺术彩纷呈,外交形式开始定型,周礼成为春秋外交的“国际法”,见唐家璇主编《中国外交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36~37 页;
- [3] 王世舜译注《尚书》,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第 156 页。
- [4] 黎虎教授在《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中指出:中国古代有外交一词,但其含义与今天有所不同,鲁隐公时祭国国君出访鲁国(前 722 年),被认为是“不合礼的活动”,因为当时的观念是“为人臣者无外交”,所以“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战国时的苏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外交概念,认为“夫为人臣者,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是不好的事情。但到了唐朝,

颜师古对孙子兵法中的“其次伐交”作注时,认为“知敌有外交连结者,则间误之,令其解散也”,已经有了“对外交往”的意义了。同时,中国古代经典上使用的邦交,聘,朝等语,实际上也有外交的意义。所以,虽然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但不等于说中国古代没有外交。(前言,第 2 页)

- [5] 唐家璇主编的《中国外交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中,不仅列出了中国统一时的大朝如秦汉外交,隋唐外交,宋元外交,明清外交,而且已经把中国古代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作为外交关系来研究了,该辞典列出了春秋战国外交,三国外交,两晋十六国外交,南北朝外交,辽金夏外交等条目。
- [6] 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 年中文版,中文版序,第 4 页;
- [7]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 年中文版,第 4 页。
- [8] 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中文版,215 页。
- [9] 何曜、任晓:《均势理论反思》,载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9~235 页。
- [10]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中文版,第 5 页。
- [11] 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序言,第 4 页。
- [12] 参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 页。
- [13] 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 1961 年中文版,第 126 页。
- [14] 布热津斯基:《运筹帷幄》,译林出版社 1989 年中文版,中文版序第 3 页。
- [15] 《孟子》《梁惠王章句》42,《藤文公章句》,第 128 页。
- [16] 见《管子》《七臣七主》篇,《白话管子》,岳麓书社 1993 年 6 月版;崔瑞德,鲁唯一:《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76~800 页。
- [17] 参见时殷弘:《民族主义与国家增生及伦理道德思考》,载资中筠主编《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第 34 页。
- [18] 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章科林斯与科西拉的辩论,第 26~35 页。
- [19] 《春秋左传卷五》162 页。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125 页。